

美国是如何赢得冷战的？

——评《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美利坚独步天下》及
《人心之争》

冯 峥

22 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风云变幻震惊了世界。席卷全球半个世纪之久的意识形态斗争出人意料地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国际秩序迅速进行了新的排列组合。22 年过去了，这场战争在新一代青年人的脑海里只剩下了几近模糊的印象：苏联和冷战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商品与贸易打破了国家的边界；全球化则席卷了整个世界。几乎没有人怀疑，是美国，而非它的对手，赢得了冷战。这段不一般的历史留给学者们最大的疑问之一就是：美国是如何赢得冷战的？

美国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们谨慎而乐观地评估美国在这场竞赛中的胜利。他们对美国已经赢得冷战这一事实感到毫无准备，但当他们回头再来审视这一结局的时候，一切又似乎顺理成章：噢，原来我们如此强大。他们致力于发掘那些导致美国胜利的原因，从地缘政治、经济实力、政治制度、战略谋划、政策制定、意识形态到生活方式，都有他们探寻的踪影。他们笃定，一些根本的、深层的、决定性的原因促成了美国的胜利，而这些原因亦是美国从 20 世纪初到今天一直在世界上保持优势地位的根源。

有三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在此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韩德和梅尔文·P. 莱弗勒。他们所著的三本关于冷战史及美国外交史的著

* 冯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作分别为《长和平：冷战史考察》、^①《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②和《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③这三本书在关注美国大战略和冷战史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问了相同的问题：美国是如何赢得冷战的？这三本书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赢在战略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于1968年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俄亥俄大学、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赫尔辛基大学等多所高校教书，自1997年开始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加迪斯执冷战史和大战略研究之牛耳，他的著作《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现在我们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史》、《冷战：一部新历史》都对冷战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④他还引领着世界冷战史研究的走向：创立冷战史的“后修正学派”，提出“新冷战史”研究，主张利用多方档案及“这场冲突所有主要参与者的记录”。^⑤此外，他与遏制战略的设计师乔治·F. 凯南私交甚笃，他为后者所立的传记《乔治·凯南：一个美国人的生活》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⑥

《长和平》出版于1987年，重点关注冷战中美国的战略选择。读者可以从该书中得到关于美国如何赢得冷战这一问题的启示。虽然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对外政策不断调整，但是，在处理与苏联关系时却始终保持着连贯性：遏制战略、分化对手和自我克制。

(一) 遏制战略

加迪斯指出，遏制战略起源于美国对苏联意图的不安与焦虑。苏联在第二次

^①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长和平：冷战史考察》(*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潘亚玲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

^② [美]韩德(Michael H. Hunt)：《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The American Ascendan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Gained and Wielded Global Dominance*)，马荣久、牛悦、孙力舟、杨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③ [美]梅尔文·P. 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孙闵欣、廖蔚莹、朱正、王敏、钟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5.

^⑤ 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82,转引自夏亚峰：《冷战国际史研究在中国：对过去20年研究的评述》，《国际冷战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2页。

^⑥ John Lewis Gaddis, *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2.

世界大战后不断采取单边行动来推进自身利益，并一再漠视前盟友的利益和感情，这种做法使美国人产生了持久的怀疑。这种怀疑由来已久，甚至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时，美国就认为这个兼具极权统治和意识形态好战性的国家是一种威胁。正当美国在战后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曾经的盟友、意识形态的对立者、单边主义的推行者——感到迷惑不解的时候，凯南的“长电报”及其化名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一个明晰、可信并在许多方面令人满意的解释。“遏制战略将美国在维持全球均势过程中获得的新利益，与莫斯科对欧洲平衡带来的挑战结合起来。”^①

加迪斯指出，美国的遏制战略并不是以任何手段、在所有地方实行遏制，而是选择优先排序的地方进行遏制。^② 在这一认识的影响下，美国在欧洲的遏制战略从培育“第三种力量”的偏爱转向接受与苏联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美国希望在欧洲大陆重建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即“第三种力量”来分担遏制的重任，这便是马歇尔计划实施的基础。美国随后发现，他们大大低估了在欧洲建立独立的“第三种力量”的难度：英国、法国及其更小的邻国都更愿意接受欧洲分裂的结果，而不愿承担德国复兴这一无法预知的风险。在加迪斯看来，美国的遏制战略被证明要比凯南或任何其他人当时可预见的更为稳定、更具灵活性。^③

在东亚，遏制战略具体落实为“环形防线”战略。^④ 支持“环形防线”战略的理由是：这些位置独立的沿海岛链既可作为对抗苏联扩张的堡垒，又可以最小的代价来维持。它们不仅是国家的第一道防御战线，还是将来发动收复大陆的进攻作战的基地。可谓“进可攻、退可守”、维持代价小。这样一个听上去极为合理战略却在三个战场上受到了挑战，即台湾、法属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并最终在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中被彻底抛弃了。主要原因在于，“环形防线”战略没能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什么是对均势的威胁？是苏联的扩张还是国际共产主义？当20年后尼克松总统对这种代价高昂的“灵活反应”战略进行反思，并鼓励亚洲人自力更生的时候，正说明了“环形防线”的正确性——美军从亚洲大陆的撤离并没有导致美国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丧失。

^①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的考察》，第42页。

^② 根据加迪斯在《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一书，凯南将对美国重要性由高向低排列的国家和地区列为：第一，大西洋共同体内的国家和领土，包括加拿大、格陵兰和冰岛、斯堪的纳维亚、英伦三岛、西欧、伊比利亚半岛、摩洛哥和直到突出部的西非海岸，还有从突出部往北的南美诸国；第二，往东直到并且包括伊朗在内的地中海和中东诸国；第三，日本和菲律宾。参见[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③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的考察》，第81页。

^④ “环形防线”战略为麦克阿瑟将军提议，建立一个包括阿留申群岛、中途岛、先前日本托管岛屿、冲绳、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英荷在西南太平洋的岛屿在内的防线。同上书，第95页。

(二) 分化对手

加迪斯指出,美国的决策者在战后从未真的相信存在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① 这正是美国在冷战初期对国际共产主义政策中的过人之处:它看到了共产主义内部出现异端的可能性。因此,将社会主义国家与其“精神源泉中心”苏联分化开来的目标,始终贯彻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中。

这一战略落实在具体的对外政策中便是旨在分化共产主义阵营的“楔子”战略。在冷战初期的几年里(1947—1950年),美国采取了几种策略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打入“楔子”:第一,区分反苏主义与反共主义。美国实施援助计划来避免直接“反共”,比如从吝啬的国会手中获得拨款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以及实现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第二,使莫斯科与其卫星国的关系紧张。凯南提议扩大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范围,不只援助西欧国家,也将援助提供给东欧和苏联。这一做法使苏联担忧它在东欧的地位,从而被迫加紧了对东欧的控制,这一控制结果并非对苏联有利;第三,鼓励东欧的“铁托主义”。美国对与苏联决裂的南斯拉夫维持公开的冷淡,同时悄悄地向它提供经济援助。^② 美国政府与大量的东欧流亡团体保持联系,并试图在东欧国家内部建立反苏抵抗中心;第四,鼓励中国的“铁托主义”。杜鲁门的幕僚们几乎可以肯定,“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不太可能盲目服从莫斯科的意愿……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与其南斯拉夫同伴一样,是依靠自身力量上台的,且并不依靠苏联来保持其地位。”^③

“楔子”战略在1950年代还表现为“压力”策略:向共产党人的薄弱环节施加“压力”同时利用其国内优势。“压力楔子”战略的代表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金门和马祖问题上的强硬路线:对保卫金、马给予公开支持,甚至威胁使用核武器,将此作为试图破坏北京和莫斯科关系的一种方式。尽管“楔子”战略始终存在于美国的冷战战略中,然而冷战初期实行这一战略的效用却很难在短期内显现。直到“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在北京走下空军一号从而开启长期延迟了的美中和解时——这比他在1954年对这一事件的最乐观预测早了七年——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才开始显露出来”。^④ 尽管如此,“楔子”战略被证明是相当正确的:苏联在那些超越自身军事力量可及的地区维持权威遇到了很多困难,在亚洲、非洲及中东地区都是如此。加迪斯认为,那种在美国人看来甚是恐怖的、将共产党人团结在莫斯科领导下的意识形态纽带,其实早已变成了分裂和争斗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在很早以前就赢得了冷战。

^①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的考察》,第198页。

^② 同上书,第202—212页。

^③ 同上书,第211页。

^④ 同上书,第238页。

(三) 自我克制

美苏在整个冷战过程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克制，而对美国来说，这种克制更加难得且令人惊讶。美国在冷战的头四年里处在对核武器的绝对垄断地位，在随后的五年里还保持着有效垄断（苏联缺乏投放核弹的运载手段），并且在整个冷战过程中都在军备上保持着对苏联的绝对优势。

冷战初期美国垄断了核武器，这一时期的美国决策者如何看待和使用核武器无疑为后来的选择奠定了基调。在加迪斯看来，杜鲁门政府“处在某种与乔治·华盛顿相同的位置：不管正确还是错误，它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先例”。^① 杜鲁门时期开创的三个先例是：第一，承认核武器的“独特性”。他创建了一个文官控制的原子能委员会，任何有关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都必须由最高层做出；第二，原子弹只能用于威慑而非强制，这一原则在1948年的“柏林危机”中第一次发挥了作用；第三，再一次强调常规兵力的建设。这些做法都表明，对美国政府来说，原子弹很难被使用。此后的总统面临同样困境：面临可能使用核武器的特殊情况时，他们发现，使用的代价可能会压倒预期的收益。这些代价来自军事、政治和道德三方面。^② 在至少10年的时间里，美国可以使用核武器而不用担心苏联的报复，然而，正是“不对称的两难使美国人在实践中欣然接受了‘不首先使用’的原则。”^③ 美国的自我克制维护了冷战时期那种剑拔弩张同时又小心翼翼的和平。在核技术上领先苏联十年的美国没有率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做法对苏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冲突最为激烈的大战边缘，两国领导人依然心照不宣地保持了克制。

如上所述，美国在冷战时期的主要战略可以归纳为三个：遏制战略、分化对手和自我克制。遏制意味着美国在欧洲、亚洲、中东各条战线上都保持着毫不退缩的姿态；而分化战略则意味着美国试图通过鼓励、引诱、施压的办法来促使苏联阵营的内部分裂；美国和苏联所保持的自我克制则维持了长达40多年的和平，使人类避免了毁灭性的核打击与核报复，从而使冷战在和平中结束。

二、赢在实力

韩德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在日本、土耳其和越南度过了自己的一部分青年时光，这些早年生活经历影响了他的学术兴趣。

^①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的考察》，第142页。

^② 加迪斯指出，在军事上，因为没有适当的目标，所以无法保证使用核武器是否会产生决定性的军事后果；在政治上，北约的西欧成员反对使用核武器；在道德上，使用核武器会引起种族主义怀疑。同上书，第173—174页。

^③ 同上书，第178页。

1971年,他在耶鲁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美国外交史和中国历史。他在1980年前往北卡罗来纳大学之前一直执教于耶鲁大学。其主要著作包括《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中国与美国》^①(1983年)、《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②(1987)、《林登·约翰逊的战争:美国冷战十字军在越南(1945—1968)》^③(1996)。美国外交史是他最关注的领域,当代全球史也引起了他的兴趣。韩德教授最新的两本著作是《转变中的世界:1945年至今》^④(2004)和《美利坚独步天下》(2007)。

《美利坚独步天下》虽然是一部关于美国外交史的著作,然而冷战部分占了整部书的一半以上;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全书共八章),将1941—1991年这50年间美国与世界的互动以浓墨重彩铺开,以大量的细节和叙事,令人信服地解答了开篇提出的根本问题:美国如何做到在当今世界独步天下的?这一问题放在冷战的背景下来看则成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如何经受住冷战的考验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 经济实力

“美国人如果要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就必须积累财富。”^⑤冷战开始前30年,美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美国在1919年已经稳居世界第一,占据了全球近1/5的产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复苏之后的美国在1923年产值达到7130亿美元,至1929年稳定上升(8650亿美元)。大萧条时期减少了1/4,但到1939年总产值重新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9510亿美元)。苏联和德国是两个实力最接近美国的对手,但其总产值皆不足美国的一半,英法还不到美国的1/3,而日本和意大利约为美国的1/5。^⑥当1953年苏联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时,美国的总产值仍然是它的三倍。^⑦韩德认为,美国的经济优势是赢得冷战的基础。繁荣的经济扮演了关键角色,它成为公众同他们的冷战领袖之间的交易筹码。大规模的冷战因其没有明显地伤害到总体的生产效率,从而获得公众的支持。

首先,经济不断壮大是美国成为领先世界的战争机器的前提。早在1938年,美国就占据了各大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1/3,略低于盟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① 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②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Michael H. Hunt, *Lyndon Johnson's War: America's Cold War Crusade in Vietnam, 1945-1968*,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④ Michael H. Hunt, *The World Transformed: 1945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4.

^⑤ [美]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第23页。

^⑥ 同上书,第89—90页。

^⑦ 同上书,第146页。

而比轴心国集团多出 20%。美国国内发达的工农业,支撑着数量巨大的战争物资的生产。除了充足的战争物资以外,美国还在战争的技术与科技含量上处于领先地位。1941 年开始的“曼哈顿工程”得到大量资助,这使美国在 1945 年 7 月垄断了核武器,直到 1949 年苏联成功完成首次核试验。而美国空军在 1948 年部署了第一批洲际导弹,领先苏联 7 年。^① 在其后的冷战核竞赛中,美国占据了明显优势。到 1960 年,美国拥有 7000 枚战略核弹头,苏联为 400 枚;到 1970 年美国已有 1.2223 万枚,苏联为 2443 枚。巨大的军事花费并没有削弱美国,由于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军费预算反而从 1953 年的 13% 下降至 1968 年的 9%。^② 正是由于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军备竞赛中美国始终对苏联保持了绝对优势。

其次,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支撑着美国意志在海外的实现。强大的经济支持着美国的庞大援助计划和在海外的干涉,同时还将消费主义推向全球,使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在世界上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由于收入迅速增加,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已成为了舒适的中产阶级。到 1960 年,60% 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75% 的家庭拥有一台洗衣机,87% 的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③ 这样的美好生活使“铁幕”那边的人们明显地感到了诱惑。虽然苏联和东欧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在增长,但却是西欧实际水平的一半。苏联领导人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在于它能够为普通民众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如果在这点上做不好的话,他们就会面临消费者的骚乱,以至于不得不用武力进行镇压。

(二) 民族信心

韩德提出,美国赢得冷战的第二个因素来自于民族主义的信心——一种信仰或使命感。“思想能够使人有目的性。没有广泛一致的看法,国家就无法动员资源——不论多么充裕——来实现一致的目标,以及要求公民承受牺牲和潜在的挫折来实现那些意愿。”^④这种信心不仅来自于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也来自美国模式的吸引力,以及“充满自信地运用美国的经济优势和文化影响”。^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十年里,美国充分利用自己的价值观、经济和文化优势进行了以下努力。

首先,美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建立了战后的国际新秩序。在政治领域,美国一手主导了联合国的建立。“美国领导人完全有资格称自己为联合国之父。”^⑥联合

^① [美]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第 146 页。

^② 同上书,第 142 页。

^③ 同上书,第 191 页。

^④ 同上书,第 2 页。

^⑤ 同上书,第 167 页。

^⑥ 同上书,第 169 页。

国是由罗斯福总统命名的，而联合国总部就矗立在纽约的土地上。《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国际理念与人权价值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美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次会议“为战后的国际经济提供了一种持久的框架（几乎到70年代都没有改变），它促进自由贸易，它构建的机制带来了强大的国际共识，一直延续到21世纪，影响着全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美国及其冷战盟友手中的工具；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也确立了纽约为世界金融中心及美元的国际地位。

其次，美国对遭受重创的盟友——西欧和日本——实施了援助与改革。“美国除了单方面开放国内市场外，还提供了重建资金，并且容忍战败国恢复国家经济力量。”^②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不仅获得了强大的冷战同盟，还确立了一种按照美国意愿发展的国际经济体系。通过包括马歇尔计划在内的援助，美国成功地帮助西欧恢复了经济，不仅将联邦德国从敌人变成了朋友，还密切了战后的英美关系。与此同时，日本的重建成了一场“美国新政改革式的演练”，美国把日本变成了“对抗共产主义在中国、朝鲜、菲律宾和越南进攻的永久而坚强的据点”。^③

最后，美国文化影响力急剧增强，消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推广。到20世纪50—60年代，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国内力量，而且具有比以往更大的国外影响力。“公司经理们、冷战斗士们以及自豪的民族主义者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把美国作为货物和梦想输往国外的源泉，并充分加以利用。”^④韩德举了两个美国消费攻势的例子：可口可乐和好莱坞。前者与时髦、休闲、欢乐、年轻和家庭联系起来，既是大众喜爱的产品，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象征；后者在国外制造了受大众欢迎的幻觉并赢得巨额利润。美国模式赢得了崇拜和赞美，而文化上的征服则比军事和政治上的支配更加有效、代价更低，也更为持久。

（三）强大政府及精英的领导

“只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才有可能激励经济的发展，消除内部分歧，促进共同的国家情感，并且确保祖国抵抗潜在的危险的邻国。”^⑤与一些学者认为总统权力过大而造成对外政策过于简单化的看法不同，^⑥韩德认为，强大的政府正是美国赢得冷战的原因之一。从美国建立之始，关于政府强弱的辩论就已出现，并贯穿整个美国历史。韩德在另外一本美国外交史的著作《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

^① [美]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第176页。

^② 同上书，第179页。

^③ 同上书，第187页。

^④ 同上书，第189页。

^⑤ 同上书，第2页。

^⑥ [澳]约翰·W·伯顿：《全球冲突：国际冲突的国内根源》，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提到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辩论：杰斐逊信奉民主——权力应归自由的农民、维持小规模海军、防范英国、避免卷入欧洲事务；而汉密尔顿则信奉英国模式——促进商业和工业、强化中央政府、奉行精英治理国家。^①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交锋只是多次严重分裂美国的较量中的第一个回合。它贯穿了 19 世纪，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汉密尔顿一派逐渐获得了历史天平的偏向。韩德认为，一个致力于自由和自强的民族会倾向于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以便促进国内发展，并保障国家的海外利益。冷战期间，总统权力得到了集中。“一个强有力总统——展现出帝王般的总统权力——与美国在半个多世纪内承担的全球性作用是一致的。如果总统不能运用国家的力量并为国家的价值及目标服务，那么美国地位的提升是难以想象的。”^②

韩德对统治美国的精英们（总统及其幕僚们）表现出极大兴趣。他认为，虽然美国是个民主国家，然而少数美国精英在国家强大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的领袖们理应为他们所获得的传统赞誉感到自豪，是他们设定了进程和方向，并最终塑造了美国的优势地位。只有他们能够聚集必要的物质和道德资源，集中地运用这些资源，并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获得广泛的政治合法性。”^③ 他关注在那些受到挑战的时刻里，美国领导者是如何认识挑战的，以及是如何利用、驾驭、掌握、分散或重新引导这些挑战的。比如，面对战后拉美的民族主义运动，杜鲁门的反应是宣布“第四点计划”——用私人投资来替代美国的政府援助；而艾森豪威尔则采取秘密行动——授权中情局秘密发动政变；肯尼迪在“猪湾行动”失败后，采取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的发展计划来反击共产主义。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的时候，核军备竞赛、第三世界危机、国内社会骚乱、经济增长放缓使美国领导者的处境更加困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办法是：缓和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与中国和解、退出越南、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吉米·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则继承了对苏联和中国的接触政策，推进人权和中东和平；里根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建设更强大的军队、追求战略防御计划及咄咄逼人的言辞。冷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及其幕僚们“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攘外安内的工作”。^④ 冷战的胜利让美国价值观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展。

综上所述，韩德将美国独步天下的原因归结为三点：财富、信心和领导。财富指的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只有那种有活力的和增长的经济体，才能创造出对于实现伟大的世界抱负至关重要的物质资源。”^⑤ 第二，信心指的是美国人的信仰和使命感。第三，“领导”指的是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政府，以及那些对世界形势具

^① [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第 24—26 页。

^② [美]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第 160 页。

^③ 同上书，第 7 页。

^④ 同上书，第 280 页。

^⑤ 同上书，第 2 页。

有准确判断力的精英。正是这三点,不仅使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地一跃成为国际强权,而且使美国在一个世纪内保持了世界第一的地位,并在冷战中战胜苏联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

三、赢在人心

梅尔文·P.莱弗勒是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于1972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执教于范德堡大学。1997年,他开始担任弗吉尼亚大学人文与科学研究院院长。他的早期著作包括《在迷雾中求索:美国寻求欧洲稳定与法国安全(1919—1933)》和《大国的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和冷战》,后者获得美国历史著作领域最负盛名的班克罗夫特奖。^①他参与编辑了几本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冷战的起源:一部国际关系史》、《领导世界:布什主义后的美国战略》及《剑桥冷战史》,主要关注的领域包括美外交史和冷战史。^②

莱弗勒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构思写作《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他在这部58万字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观点:冷战就是一场“人心之争”(for the soul of mankind)。莱弗勒自述在阅读大量的文献及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之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莫斯科与华盛顿的领导人往往认识到他们的竞争是事与愿违的。^③他们意识到冷战将他们卷入了地区冲突,而这种卷入和他们自己国家的重大利益并不相关。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国民所需的资源转移到美苏对抗上去?莱弗勒选取了五个重要历史时刻中的美苏领导人为案例,包括冷战开始时(1945—1948)的斯大林与杜鲁门,斯大林去世后(1953—1954)的马林科夫和艾森豪威尔,古巴导弹危机前后(1962—1965)的赫鲁晓夫、肯尼迪和约翰逊,缓和逐步崩溃中(1975—1980)的勃列日涅夫和卡特,以及冷战最后数年中(1985—1990)的戈尔巴乔夫、里根和布什,发掘他们在特殊历史时刻下面临的选择及如何做出决策。通过对这五个时刻进行详尽的甚至是不厌其烦的叙事与分析,莱弗勒论证在这些历史关头两国领导人不断错过了“和平的机会”,直到里根与戈尔巴乔夫才最终结束了冷战。

^① Melvyn P. Leffler, *The Elusive Quest: America's Pursuit of European Stability and French Security, 1919-193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Melvyn P. Leffler and David S. Painter eds.,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4; Melvyn P. Leffler and Jeffrey W. Legro eds., *To Lead the World: American Strategy After the Bush Doctr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第2页。

(一) 何为“人心之争”？

“冷战所争夺的正是人心的向背。”莱弗勒引用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一句话来进行解释：“这是一场对生活方式的斗争。”^①他没有使用“意识形态”作为核心概念，但是纵观全文可以肯定，他所说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内涵是一致的。莱弗勒在全书的结论中说到，“意识形态决定人们的观念——这是冷战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之一”。^②综合莱弗勒在全书中的表述，可以将他笔下的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对自己国家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必然优于对方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既来自于对自身制度的热爱与耐心维护，还来自对对方制度的憎恶与谨慎对抗。即使在己方处于守势而对方处于攻势的情况下，这种自信依然未曾削减。这就是观念的力量或者说意识形态的力量之所以强大并发挥重要影响的原因。

为什么说美苏之间进行的这场冷战是一场“人心之争”？美苏领导人都坚定地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生存最优越的组织形式。具体而言，克里姆林宫认为，他们在改造人类社会、根除人类的剥削、通过消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把人类的贪念转化为人类进步的推动力等方面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工人将不再任由雇主摆布，受压迫的人民也将不再屈从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笃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和平必将得到永存，公平正义必将得以实现，全人类必将得到解放。”^③与此相对，白宫更强调自由的人民、开放的市场，政党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公民利益而展开权力斗争。“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是人类进步和个人机遇的关键所在。”^④这是白宫的信条。

尽管在整个冷战期间，危机与缓和并存，攻守之势交替，但两个阵营的领导者都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制度代表着最先进的生活方式和最美好的人类未来。也正是因为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的束缚，美苏双方无法做出和平的决策，不断将国内资源用于对抗，导致冷战延续了40余年。“既然意识形态的预想决定了双方对威胁的认识，以及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机遇的看法，就不会有真正的缓和与和平。”^⑤美国和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但是“双方领导人都无法将自己从恐惧中释放出来”。^⑥然而，莱弗勒肯定地说道，最终，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在冷战中失败了；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赢得了冷战。西欧在重新塑造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过程中采取的主动行为和取得的成功，对美国的胜利给予了

^① [美]梅尔文·P. 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第1页。

^② 同上书，第438页。

^③ 同上书，第434页。

^④ 同上书，第434页。

^⑤ 同上书，第131页。

^⑥ 同上书，第131页。

强有力的援助。^①冷战考验了两种可供选择的统治及政治经济制度应付后殖民和后工业时代挑战的能力。“生活体验是决定冷战结果的关键。而冷战中真正的大战略是西方在自己人民生活体验上取得的成功,而不是地缘政治格局、海陆空规模或公共外交的成功。”^②最终,具有“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和“乐观自信”的里根共同结束了冷战。

(二) “美利坚的清晨”

“每一天都是‘美利坚的清晨’。”这是1984年里根在竞选中提出的口号。这一说法代表了美国人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典型看法:“任何人每天都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创业精神和个人创造来决定自己的命运。”^③几代美国领导人都受到历史记忆的影响,也同时受到理想的鼓舞:“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的过去证实了不论是法西斯主义、纳粹政权还是共产主义,任何集权主义政府都有可能进行扩张,粉碎人类的自由之梦——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拥有财产的自由以及贸易自由。”^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看到的是一个带着扩张思想的极权主义强国,这个强国的存在威胁着美国的生活方式。他说:“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对我们所信仰的民主信念的外在表达。”^⑤杜鲁门采取了进攻的方式——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西德的重建——来保存美国的生活方式。冷战于是便开始了。

斯大林死后,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人马林科夫向艾森豪威尔伸出橄榄枝。然而和平的机会转瞬即逝。由于担心德国军力的发展和胡志明在越南夺取政权,艾森豪威尔决定继续对莫斯科保持攻势。莱弗勒将艾森豪威尔描述为一个“才能出众的领袖:意志坚定、严于律己、坚守原则、乐于助人、充满自信。”^⑥这位总统对冷战的看法是:“美国的目的在于保护一种生活方式,而非简单地保卫财产、领土、房屋或生命”。^⑦

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选择了妥协并开始寻求缓和,这却令肯尼迪总统对苏联的信任消失殆尽。他始终对赫鲁晓夫的缓和要求反应冷淡。肯尼迪这种做法受到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美国和苏联对世界、自

^① 《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在线网外交专栏圆桌书评对梅尔文·莱弗勒〈人心之争〉一书的评论》,邓峰译,《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232页。

^② [美]梅尔文·P.莱弗勒:《美国赢得冷战的大战略》,载牛军主编:《冷战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③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和冷战》,第330页。

^④ 同上书,第435页。

^⑤ 同上书,第69页。

^⑥ 同上书,第80页。

^⑦ 同上书,第83页。

由以及未来持有迥然不同的看法。”^①他认为，苏联人正通过诡计多端和胆大妄为，谋求创造一个巨大的共产主义世界。

卡特上台后将人权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中心之一。与基辛格追求实力平衡、肯尼迪追求强势、杜鲁门追求遏制不同的是，他希望恢复国民对“人类自由的梦想”的信心。他希望能够维持美苏缓和，寻求超越冷战的机会，然而局势却持续动荡不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不断敦促卡特巩固同盟关系，打击苏联在非洲的投机野心。“伊朗人质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要求卡特采取坚决的行动，而卡特仍希望给美苏缓和留有一丝生机，然而苏联入侵阿富汗宣告了缓和的终结。

里根总统被人们称为最冷面的“冷战士”。他在咄咄逼人的言辞里将苏联斥为“邪恶帝国”，并为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感到自豪：“西方国家不会接纳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会被超越。”^②他坚信苏联体制正摇摇欲坠，而自己的政治使命就是要捍卫自己理想中的美国，以及能够赋予人民机遇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尽管表面强硬，他却始终在寻求和苏联领导人谈判，坚持保持对话，同时又对克里姆林宫保持压力。尽管莱弗勒强调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但是他也高度评价里根在外交中所体现出来的个人魅力、政治魄力和可信赖感。里根对结束冷战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在于他所引起的恐慌，而在于他所激发出的信任感”。^③

（三）“莫斯科的黄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面临的任务极为艰巨。国家需要重建，而外部形势则令人忧虑。面对美国的攻势，斯大林并不感到惊讶。“资本主义者露出其本性，拉帮结派要对付苏联。”^④如果西方愿意合作，斯大林准备冷却革命同志的热情；但是，一旦杜鲁门宣布他要为争夺人心而发动一场对抗邪恶的战争时，斯大林的内心潜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显露。莱弗勒写道，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充满猜疑，进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求推动革命的机会，“疑心病”压住了他对国家合作的愿望。

斯大林死后，以马林科夫首的新领导集体感到心慌意乱、局促不安。他们不知道该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处，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国内民众对理想社会的渴求。马林科夫希望尽快实现缓和，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并提出苏联的使命是“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⑤他希望美国给和平一个机会，然而随后在东德发生的暴乱和贝利亚的被捕让艾森豪威尔决定错过这个和平的机会。

^① [美]梅尔文·P. 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和冷战》，第175页。

^② 同上书，第329页。

^③ 同上书，第430页。

^④ 同上书，第53页。

^⑤ 同上书，第77页。

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选择了退让。这次擦身而过的核战争让赫鲁晓夫下定决心要推进和平进程。“他再也不想经历危机或战争。”^①赫鲁晓夫认为，苏联领导人应当证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经济建设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上是最优越的，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远远优于资本主义国家。”^②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议题是控制军备竞赛，重新分配资源，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为了保护和培育他所最珍视的社会主义事业，赫鲁晓夫清楚地知道他需要缓和竞争，然而苏联的盟国却制约了缓和的实现，而美国在德国和古巴的行动使缓和变得极为艰难。

勃列日涅夫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未来社会制度”，而“共产主义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③他深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生产上的无序混乱将被科学的计划经济管理所取代”。“几个世纪以来的落后局面”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得以克服。^④勃涅日列夫一直试图推动缓和，他希望在和平竞争中展示共产主义的优越性，然而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一做法“谋杀”了缓和。

戈尔巴乔夫的上台预示着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变。他对内要求加速生产、整顿经济管理、推进开放和民主，对外则积极推动军备裁减。他希望通过恢复社会主义在国内的活力，来提升苏联在国际上的形象。戈尔巴乔夫给里根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两人突破桎梏，达成了《美苏中程和短程核力量条约》(INF)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一年后，戈尔巴乔夫又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旨在重新塑造苏联的形象，关注共产主义的人本价值。他告诉国人：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利益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能得到保证”。^⑤

莱弗勒得出结论：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⑥戈尔巴乔夫感到资本主义对手不会威胁到苏联的安全，而共产主义在国外也没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他希望与美国谈判并合作，将国家资源用于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改革，从而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典范。“他最向往的，是为苏联共产主义的真正承诺找一条重新振兴的出路。要达成这一点，他需要做的就是结束冷战。”^⑦

^① [美]梅尔文·P. 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和冷战》，第140页。

^② 同上书，第148页。

^③ 同上书，第243页。

^④ 同上书，第243页。

^⑤ 同上书，第407页。

^⑥ 同上书，第430页。

^⑦ 同上书，第431页。

四、评 价

这三本书从三个角度阐释了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冷战的起源及结束等一些重大问题。它们最大的共同点是都采用了“新冷战史”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在方法上注重第一手档案的挖掘，在观点上注重领导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及决策制定的具体过程。他们所使用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与国际政治研究方法大为不同——前者重视个人因素和历史过程，而后者则重视制度因素和体系结构。当然，这三本书中的一些观点也受到学术界的挑战。

(一) “新冷战史”的研究方法

“新冷战史”研究或称“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是加迪斯在1996年2月召开的一次主题为“冷战的起源”的学术会议中提出的。这一观点在冷战史研究中产生了持久的、不容忽视的影响。^①他指出，在战后几代国际关系学者身上，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将自己的研究“科学化”的倾向，其结果是越来越强调历史演变的“规律性”、事件重复的可能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进程的可预测性；与此同时，忽略了人类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行为主体，其活动所必然具有的非规律性、突变型及不可预测性。^②因此，加迪斯主张利用来自不同国家的档案进行比较、对照，重新审视、考察关于冷战和外交史的已有结论。总体来说，这三部著作都体现了“新冷战史”的研究方法，具有三个共同特征：

第一，这三本书的论点都建立在丰富多样的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加迪斯提出，“新冷战史”研究在进一步加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档案资料利用的同时，应当重视对于“冷战中另一方”的档案资料的利用。^③这三部著作都广泛而深入地挖掘了美国各大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以莱弗勒为例，他的材料来源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档案、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总统图书馆档案（杜鲁门图书馆、艾森豪威尔图书馆、肯尼迪图书馆、约翰逊图书馆、卡特图书馆和里根图书馆）、总统录音、已经公布的美国政府文件，包括众议院、参议院、行政部门（白宫、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作者们同时还引证了来自俄国、德国、东欧国家、中国的学者所发掘和引用的各种新资料。这种通过多方档案相互佐证的方法，加强了冷战史研

^① 有关“新冷战史”研究的介绍与论述，参见戴超武：《“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②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Winter 1992/1993, pp. 53-54.

^③ 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页。

究的精确性。将过去的观点通过新的史料重新考证,这也为冷战史研究开启了新的角度。

第二,这三本书都强调决策者个人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关注领导者及其幕僚们的个人经历和认知变化。三位作者肯定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的影响,但更重视和更擅长的是分析领导者的个人成长经历及其心理特征。他们认为,领导人是重大外交决策的制定者,他们面对国际形势的挑战和压力时的考虑与选择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莱弗勒在《人心之争》的序言中坦陈:“由于对个人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及偶然性很感兴趣,我把焦点集中到了领导人身上。他们想做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是怎样受到局势的限制、盟友或扈从的压力、国内偶发事件的打击或是信念与历史回忆的禁锢?”^①这种关切成为他们的观察视角并贯穿始终。以冷战后期的美国总统里根为例,韩德的描述是:“他根据直觉行事。……战略防御计划之所以非常吸引里根,至少部分上因为他对细节既不了解,也不关心。”^②里根的乐观态度背后是他“坚定、强大和简单的民族主义视角”。^③莱弗勒笔下的里根“拥有自己的天赋:个人魅力、核心观念,对自己及自己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极为乐观。……他有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里根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愿意与自己所憎恨的领导层、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人打交道;他愿意以欣赏的眼光看待竞争对手所关切的内容;他愿意从经验中汲取教训。”^④在这三本书中,对美苏最高领导人及其幕僚的分析极为详尽,从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到他们面对危局的心理活动都给予高度重视。

第三,这三本书都关注政策制定及美苏互动的过程。加迪斯认为,孤立地研究一国的大战略是没有意义的。“大战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研究大战略需要研究世界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历史。”^⑤《长和平》一书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加迪斯在书中指出,冷战的开始源于美苏互动过程中美国对苏联的不信任与受威胁感;美国在具有核优势的情况下未对苏联使用核武器这一做法,为美苏两国在冷战过程中保持克制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而苏联对美国使用侦察卫星的默许态度也降低了战争爆发的风险。《人心之争》更是如此,莱弗勒将美苏领导人之间互动的过程描述得细致入微。他甚至认为,战略和政策是在互动中形成的。比如,戈尔巴乔夫在与里根的互动中被后者的魅力所折服,他对美国的信任感是他在国内推行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

^①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和冷战》,第4页。

^② [美]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第275页。

^③ 同上书,第274页。

^④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和冷战》,第330页。

^⑤ [美]约翰·盖迪斯:《遏制战略研究的启示》,载牛军主编:《冷战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二) 三种观点的联系与整合

上文主要论述了这三本书在观点上的差异，即加迪斯强调战略的成败，韩德比较实力的强弱，而莱弗勒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的输赢，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决定性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观点并非泾渭分明。第一，三本书在不同程度上关注“意识形态”在赢得冷战中的重要作用。莱弗勒的观点自然无需赘言，而在加迪斯看来，美国的战略——如马歇尔计划——目的是帮助那些被战争打垮的工业国家重建信心和士气，从而对抗共产党在选举中的胜利。“尽管国内的民主也许不要求存在一个完全民主的世界，但它也无法在一个完全极权主义的世界上生存下去。”^①在加迪斯看来，美国的冷战战略一直都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韩德在书中则指出，美国式的消费主义在全球扩展，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开始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生活方式伴随着可口可乐、洗衣机、缝纫机、厨房用具、化妆品、好莱坞和摇滚乐一起渗到了铁幕之后。这一现象造成的结果是：如果不能创造相同水平的消费与繁荣，集权主义则会面临统治危机。^②第二，三本书在不同程度上也关注“战略”的作用。莱弗勒不否认“冷战大战略”的存在，并认为冷战大战略涵盖了意识形态。在他看来，美国的冷战大战略：“第一是美国力图维持位于工业心脏地带的开放市场，这些地区包括西德、西欧和东北亚；第二是美国政府希望民主社会和民主资本主义能够见效，从而让越来越多的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希望用他们自己的风格效仿并保持这样的生活方式。”^③保持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成了大战略的一部分。而韩德则强调美国精英的审时度势，他们凭借良好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对世界做出准确判断力和理性的选择，而准确判断和理性选择正是战略制定的基础和条件。

这三种观点究竟如何相关联呢？小约瑟夫·奈曾对不同的解释做出过整合，他将冷战结束和美国获胜的几种解释分为突发原因、中层原因和深层原因。^④导致冷战结束最重要的突发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因素：戈尔巴乔夫发动了一场失控的改革，从而引发了苏联的崩溃。莱弗勒虽然也强调戈尔巴乔夫的个人作用，但与奈所持批评态度不同的是，他对后者进行了热情的赞扬：“戈尔巴乔夫反应机敏、精神饱满、魅力非凡……思维转变最为彻底，并不畏惧于美国的实力”，而是被里根总统的“个人魅力、政治魄力和毁灭核武器的愿望所折服”，^⑤他为了使苏联找

^①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34页。

^② [美]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第191页。

^③ [美]梅尔文·莱弗勒：《美国赢得冷战的大战略》，载牛军主编：《冷战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④ 关于小约瑟夫·奈关于冷战结束的解释的总结，参见[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冷战的结束”一节，第156—162页。

^⑤ [美]梅尔文·P. 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第430页。

到一条重新振兴的出路而结束了冷战。奈指出,美国取胜而苏联失败的两个中层原因是美国的自由观念(凯南提出的“遏制”苏联意识形态)和苏联的过度扩张(保罗·肯尼迪提出的“帝国过度扩张”论)。深层原因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和苏联经济的衰退,这一解释接近于韩德关于美国实力的决定性作用的论述。

如何评价这几种观点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大战略”这个词。加迪斯在《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的前言中提到对“战略”的理解:“我用‘战略’一词,是颇为简单地指目的与手段、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联系起来的一个过程。”^①另外一些美国研究者给美国大战略的界定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美国在世界上必须维护的核心利益是什么?第二,对这些核心利益的威胁来自何方?第三,用以应对外部威胁的资源、手段和方法是什么?”^②如果按照这一界定,可以将这三种观点进行另一种整合:(1)美国在世界上必须维护的核心利益是“美国式的生活方式”(莱弗勒的“人心”观点);(2)对这些核心利益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3)美国用以应对外部威胁、维护核心利益的资源是美国“独步天下”的实力,包括经济、军事上的“硬实力”和文化、科技和制度上的“软实力”(韩德的“实力”观点);根据实力的强弱选择合理战略:以欧洲与日本安全为优先考虑的同时,“遏制”苏联的扩张,并根据自身的实力强弱来扩大或收缩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加迪斯的“战略”观点)。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这三种观点各自阐明了美国大战略的一部分。

(三) 贡献与挑战

这三本书对“美国如何赢得冷战”这一问题给出了各自答案,它们提供的三种不同视角已经成为理解冷战的三把钥匙。但是,它们也受到学术界的挑战。

加迪斯的《长和平》虽然是一本历史学著作,但被认为对国际关系理论亦有重大贡献。他对“长久和平”国际体系的论述支持了“两极平衡”的结构现实主义假设。加迪斯通过对历史案例的深度分析,解释了为什么超级大国之间维持了“持久和平”现象,并提出国防科技的革命性发展起到了权力平衡的、看不见的“极”的作用。^③在对历史事件的判断上,加迪斯的观点受到来自莱弗勒的挑战。前者认为里根设计出了“一套新的、成功打破僵局的大战略”,而莱弗勒则针锋相对地认为,里根并没有一个赢得冷战的大战略。

韩德在《美利坚独步天下》中提出,导致美国在世界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三个原因:财富、信心和强大政府的领导,为美国在一个多世纪内保持独一无二地位这一

^① [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6页。

^② 牛军主编:《冷战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第3页。

^③ 张曙光:《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

现象做出了有力的解释。然而，本书观点也面临一些挑战：第一，他指出，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财富和消费主义文化维持了美国的优势地位，从而在冷战中战胜了它的对手。而财富的积累取决于推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一个致力于创新的社会。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美国会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而其他国家却相形见绌？第二，他指出，民族主义的信心非常重要，即美国精英（主要是英国后裔）所具有的民族优越感和“天定命运”感。然而他没有解释，当美国处在优势地位或者遭受威胁的时候，民族主义的信心是如何帮助美国领导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此外，韩德也没有解释信心与实力之间的关系。

莱弗勒的《人心之争》是一本一丝不苟的书，他对冷战的各方面都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他的主要观点——“冷战就是在争夺人心向背”——为冷战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他的论述也引起一定争议。首先，他在书中介绍和分析了美苏领导人自身的意识形态，但他几乎没有对双方在国内和国际上争夺人心的效果进行阐述——第三世界国家是如何在两种“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的？苏联为什么在“人心之争”的过程中失败了？第二，莱弗勒细致的观察着眼于领导人，对民众的反应与选择却有所忽略。既然冷战是一场“人心之争”，那么争夺的重点应该是两大阵营国家内部的人民及第三世界国内的民众，而莱弗勒几乎没有涉及对民众生活状态的讨论。第三，莱弗勒再三阐明，双方的领导人都有做出选择的机会，然而却不断地错失了，“这是一部错过机会的历史。”^①于是质疑便产生了：为什么到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时期，这一机会就被抓住了？个人在重大历史进程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按照莱弗勒的观点，戈尔巴乔夫为了赢得人心从而结束了冷战，他却没有强调积重难返的苏联体制等客观原因。第四，莱弗勒忽略了两个超级大国势力范围内出现的动乱和颠覆。约翰·伯顿在其《全球冲突》中提出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冲突的主要根源在于每一制度的内在缺陷，这些缺陷使各方甚至在没有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也缺乏安全感。^②另外，关于案例的选择也面临着质疑：为什么莱弗勒忽略了尼克松这个重要人物在冷战中的作用？尼克松—基辛格年代被认为是缓和步伐迈得最快的时期。^③

尽管面临着来自多方的挑战，这三部著作仍然是解读冷战、研究美外交和美苏关系时必读的三本经典之作。冷战已经成为历史，那么，我们从阅读历史中能够收获什么呢？加迪斯在《长和平》的结束语中说：“谁能说一个世纪后的历史学家——如果到时还有的话——将会如何回过头来看我们？如若他们根本不把我们的时代视为‘冷战’，而把它视为与梅特涅和俾斯麦时代一样难得且美好的记忆中

^① [美]梅尔文·P. 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第9页。

^② [澳]约翰·W. 伯顿：《全球冲突：国际冲突的国内根源》，第2页。

^③ 《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在线网外交专栏圆桌书评对梅尔文·莱弗勒〈人心之争〉一书的评论》，邓峰译，《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222页。

的‘长和平’，是否这真的很不合乎情理？抑或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抑或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推测？”^①他的感慨不无道理。当人们的记忆从冷战的紧张中慢慢消退的时候，许多人很有可能再也想不起来那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甚至想不起来美国是如何取得了胜利，而美国的对手又是谁。这些历史著作开启我们的思考：美国如何在一个多世纪内保持了自己的优势？我们如何从美国的经验中获得启发，以应对这个保持了一个多世纪优势的国家？以及在美国不断衰落、中国开始崛起的新情势中，如何创造出一种不同于冷战的大国相处方式？

^①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 316 页。